



国际民间组织合作论坛 中文版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
China Association for NGO Cooperation

主办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2015年 第3期 总第128期 5月30日
主 编：黄浩明 责任编辑：王玲 封雄

北京地区非出版单位印刷内部资料准证京内资准字1999-L0724

架起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通过国际合作促进扶贫和公民社会建设

—访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黄浩明

编者按 2014年7月9日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在京接受了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室傅洛达博士的专访。谈话内容很丰富、很精彩，意义深远，语言精练，现摘要发表如下，以飨读者。

傅洛达（下文简称傅）：三个资金来源：1、政府拨款，2、基金会的资助，3、企业资助。哪种是你们项目资金的最主要来源？

黄浩明（下文简称黄）：第一，民促会没有一分钱的政府拨款。第二，实际上民促会得到项目资助主要来源是基金会，国内外基金会都有资助，这个来源是目前民促会的项目资金的主体；第三、企业资助也是重要的来源之一，但是企业的资助量还比较少，我们做过统计应该占3%左右。还有一部分，就是第四个资金来源是民促会服务的收入。它是通过服务得到的，管理费、人员费和项目的财务等一些服务费用。

傅：你们主要是单独申请项目资金还是与其他中国民间组织的合作伙伴(如官办非政府组织/草根NGO)一起申请?比如在强制性竞争招标投标的情况下。

黄：你说的这两种都有，但是资金的分配主要是项目设计来决定的，比如说咱们做欧盟项目“在京外来务工女性就业促进与权益保护”，我们在项目设计阶段已经确定了资金的分配，所以一般不会有太大的矛盾。我们跟欧洲民间组织合作的其他项目，比如像志愿者项目，他的申请也是很清楚的，就是跟欧方合作，欧方配多少钱，民促会配多少钱这都是比较清楚的。

傅：您觉得单一合作伙伴和多方合作伙伴模式有哪些优缺点？

黄：民促会目前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我们直接执行，民促会总部负责项目的直接执行。比如我们的民间组织能力建设项目。这种执行的特点相对来说是财务的管理控制成本相对简单一些，风险比较小，但是缺点是我们的工作量大，需要很细致的周到安排，不能出任何问题，因为还要经过援助机构制定的审计事务所进行全程的审计。第二种是委托执行，委

托执行就是所谓的多方合作。因为我们有一些项目比如在新疆或者在青海，项目地点的距离比较远，我们直接执行不太实际，所以通过委托地方的合作伙伴，但是我们优先与民促会的会员单位合作，其次才是一些推荐的合作伙伴。委托执行对管理层相对比较简单，它主要负责这个项目的监控、项目的流程管理和项目的审计和监督、财务的审计和监督。缺点是风险比较大，如果合作伙伴选的好，风险可能就小，如果合作伙伴选的不好，这个时候执行的误差还是存在的。第三种模式是共同执行，我们跟美国环保协会共同做绿色出行基金，绿色出行基金网络，这样的模式，一般来说在项目设计阶段，时间花的比较长，因为双方要有对项目的目标，对项目的战略考虑，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个重要的过程就是磨合，这个磨合比委托执行，比其它执行时间都要长，但一旦磨合好了，执行起来还是比较有效的，当然成本的控制相对也比较好，因为双方需要不断的沟通和协商。

傅：你觉得在过去五年里，国内外机构相互合作的方式是否有着比较明显的变化？

导 读

- ★ “‘一带一路’大战略下 民间组织的国际化道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办
- ★ 探索多元合作途径 升华社会组织潜能
- ★ 关于遴选第六届中国贫困山区优秀校长国际领导力奖学金项目优秀校长的通知
- ★ 2015新常态下的公益事业发展论坛在沪举办
- ★ 中国民促会家长教师合作委员会成立

黄: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跟欧洲的一些合作机构或人,比如你,我们大家都比较熟,一般合作起来沟通还是比较有效果,效率还比较高一些。但是如果对方是新的合作机构,对民促会不了解,或者民促会对其机构执行能力也不了解,或者了解的不够,这样在管理过程之中还是非常的困难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沟通的背后是文化的差异,实际上是文化区别比较大,比如欧洲人做事,和亚洲人做事,中国人做事还是有些比较大的区别。比如说欧方那边有的工作人员休假,你就没法正常开展工作了,因为这是雷打不动,但是在中国,如果有人休假,其他人会代替做。第三点,合作的变化主要是根据项目目标导向,当然也有以我们的项目结果为导向,根据目标和结果两种模式实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感觉到这种变化对民促会是一个挑战,包括人员的素质,新来的员工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培训。

傅:你们会不会觉得国外的一些基金会,以及多边或双边机构,有时候会不会把目标定得太高了,你们会不会在这方面做比较多的沟通?

黄:实际上在确定目标的时候,主要还是对双边的国情不了解,我认为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差异吧。所谓目标高和低是对国情不了解,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了解。我们倒也不觉得目标高低是问题,主要是我们通常考虑的是项目能不能实施,我们强调的可操作性,如果你不可操作,目标即使不高也实现不了,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双方还是有差异的。

傅:最近几年是否有这样一个现象:中国公民社会在成长乃至成熟的过程中,是否在资金的竞争方面出现了市场化的现象?你们是否利用市场的机制来分配资源?

黄:市场化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中国现在一个新名词叫倒逼现象。你要调整目标,你现在能力不行,你可能要提高你的能力,这是一个好的表现。第二,通过招标投标或者市场的模式提高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也比较科学。这样使项目设计、项目管理比较认真。如果你的资金来的很容易,可能就不重视。所以我倒觉得市场化是发展的方向。是否用市场机制来分配资源,这个我觉得是正确的,比如说我们在民政部做的残障人士服务和支持项目,这个是政府购买服务。

傅:政府不提供管理费?

黄:对。政府部门实际没有完全走市场路线,一部分是市场,一部分还没有完全市场化。

傅:你们对中国公民社会是否有一个自己的理解,是的话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如果不是,你们机构采用什么样的话语?

黄:我们现在公民结社的权利,这是宪法规定的,而公民结社与文化有着重要的关联性,因为中国不像欧美结社的历史比较悠久,再加上文化的差异,结社的方式跟西方也不太一样,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二个公民之间有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重要原则,包括我们民促会到我们服务的群体,或者民促会向捐赠人筹资,我们还是要坚持平等的原则,相互尊重的原则,而不是你捐赠人就是恩赐的感觉。我们提倡的是尊重捐赠人也尊重被服务的人,就是双尊重,这是我们提出来的工作要求和基本原则。第三,公民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共同体,是

一个不同利益体的博弈。因为一般的我们讲结社是兴趣所在,或者目标有很多相似,宗旨有很多相似,但实践当中并不是完全一样。公民内部组织的民主或者公民之间既有相互尊重,也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也存在一种相互歧视的现象,这都是存在的。我觉得理解公民社会有三个大的要素,第一个是权利,就是自愿参与,自愿不参与,第二个要尊重,要平等,第三个相当于共同利益体的博弈,形成一个新的目标。

傅:有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低信任的社会。你是否同意这个观点?如果同意,通过长期的公民社会建设,通过中国公民的行为或者通过一些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能不能建立起来,把整个国家的信任度提高?

黄:这个理解我个人觉得是对了一部分,但不一定全正确。原因是这样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时间比较长,两千四百多年历史,所以中国在公民互动方面,是以家族为基础的,或者以家族成员组成的,所以他是公民社会当中最坚实的基础,也就是我们讲的血缘关系。为什么出现不信任关系呢?实际上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什么结构变化呢?现在中国的一般城市家庭成员,一家只有一个孩子,当然农村还有两个三个四个都有,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的人口家庭结构变小了。原来我们所提倡的家族的影响力和范围我认为下降了很多,社会原来比较牢固的社会基础,信任基础是以家庭,家庭再传播到社会。现在不是,现在家庭变小了,跟社会的互动信任发生了变化,所以中国变成了一个转型的社会,信任出现了危机。原因就是原来的链条已经没有了,独生子女不会出现舅舅、伯伯、叔叔、姑姑和姨辈什么的,我们这个年龄还有,我的女儿她们那一辈真的就没有了,都生一个孩子,就没有这种关系了,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为什么说对了一部分呢?整个信任是因为有市场竞争的引入,这个时候对金钱的追求,对社会生活高质量的追求和社会价值观的认知等,我认为是对的,但在追求过程中,又容易把传统的东西忘掉,就出现了不信任。比如,因为父母的财产或房产,两三个孩子产生争执。但是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以后就变成一个孩子了,可能就不存在这个争执了,所以信任是处在曲线状态,并不完全是平的,它可能是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是曲线状态,所以我觉得这种低信任社会的结论是不完全对的,有对的一部分,也有不符合中国文化变迁的因素,社会人口结构资源的整个变化,外部环境的变化造成了信任危机。

傅:很多人提到,草根NGO缺乏资金来源,这个会不会影响到社区发展,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黄:先讲社区,中国三十年前的社区比较简单,就是大院社区例如:大学大院,机关大院,工厂大院,部队大院,再加上老北京胡同,胡同文化。现在不是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区的结构变成了一个综合型,原来人的组成可能是单一的,现在变成多元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贫富差距发生了变化,过去因为毛泽东时代社区成员之间贫富差距不是很大。现在不是,新社区建立以后,贫富差距发生了变化。第三个新居民和老居民,外来人和原居民之间的冲突,这三个要素导致了我们现在中国社区的变化。这样就回到草根组织缺乏资源来源,比如单一社区动员的很快,因为这是熟人社会。现在不是

熟人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变成了贫富差距很悬殊的、冲突的社会，社会的构成不是单一的，变成多元了，变成了外来人和原来居民的矛盾，这样筹资就面临着挑战，信任度就发生了变化，信任度已经往下走了。

傅：我采访过一些私募基金会的管理层，他们现在都希望变为公募基金会，也希望未来NGO能够自己公募，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可能公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老百姓不一定信任你这个机构，你觉得有哪些比较好的办法，提高公众对NGO的信任度？

黄：这个话题比较大，总体来说我们现在信任成份发生了变化，信任度的高低，又与社会的结构变化产生很大的关联性，比如三十年前或者三十五年前，或者四十年前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信息技术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平衡，或者得到信息的人，和不知道信息的人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性，这是中国社会产生的第二个难点。第三个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信息不对称，这样就造成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感，这是为什么更多中国人选用微信而不用微博，或者不用博客，原因是微信是解决了结社问题，微博可能解决了自由问题，我自己在那儿说，自说自话，我想说什么说什么，但微信不是，微信直接有制约的，我们是这么一个小圈子，相当于熟人社会，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作为NGO有没有办法解决它，我觉得不是用一个简单的语言来描述的，它需要有一个系统的信任重建，所谓信任重建，第一就是说你如何重建新的熟人社会，第二如何组成新的相互信任的群，第三个是如何建设一个大家具有共同利益的共同体。这三个之间我个人觉得它逻辑上有内在的关系，为什么不那么简单呢？内在的东西会影响外部的东西，外部也会影响内部的东西，我们叫矛盾重叠的时代，矛盾重叠的时候，有人会看到并解决主要矛盾，而不是次要矛盾，有的人说我优先解决简单的，再解决复杂的，这个时候方法很多，选择度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要考虑中国社会的变迁，要放大一些，不能单用信任度这个维度衡量变化的外部环境。

傅：我们说说变化，你们在哪个层面促成个人、组织、社会的和/或政策的变化？

黄：民促会会员刚开始包括扶贫的、有环保的、有残障人士的、有妇女组织、有农村发展的组织，现在就不是了，民促会会员服务发生了变化，比如气候变化变成了一个网络，这个时候我们对政策影响，比如向国家提出《气候变化立法》的民间组织的建议。你在民促会工作的时候，我们倡导的26度空调节能行动，那都是单一的，没有一个战略的考虑，现在不是，我们从一个网络，或者这个行业的角度进而推动变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政府也需要公民社会给他提意见、提建议，比如说民促会2013年做了一个研究课题，关于社会组织国际化，政府对这个课题也感兴趣，我们做完以后国家民政部还给我们评了一个一等奖，这个是很大的变化，我们社会有需求了，过去是没需求的。第三个，这也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分化，一部分就走专业化道路，一部分就走草根路线，还有一部分走国际化路线，分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社会大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大的整个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都

发生了变化，这样就导致了中国社会更加的复杂，公民社会本身是一个多元的，再加上外部的变化，就更多元了，这是很大的不同点。

傅：您刚才提到的国际化路线、本土化路线非常有意思。您个人是怎么看本土化路线、国际化路线的？这些民间组织在什么程度上确实需要本土化，又在哪些方面应该国际化？

黄：这两个命题，从逻辑上讲实际是有系统工程的。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看，举个中国餐馆的例子，全世界都有中餐馆，餐馆国际化，反过来这个餐馆来源于中国，它是来自于本土，又往全世界推广，所以不要把本土化和国际化变成一个冲突的概念，我认为是关联的概念。所以从社会某一个事件来看，本土化也好，国际化也好，是一个过程，你不能过于强调国际化，也不能过于强调本土化，我觉得别说过头，这是一个过程的控制而已，比如说我就是本土，我不要国际的，但是你用东西还是国际的东西，比如iPhone，我不用iPhone，我用三星，三星也是韩国的，华为是中国的，但是芯片可能是日本的，技术是美国的。

傅：你们如何处理在项目和计划的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在满足伙伴机构新要求或新需求方面，你们又是怎么变通的？

黄：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项目的设计阶段是不是考虑到捐赠人的意愿，是不是考虑到受益人的承载能力，是不是考虑到他的执行能力，三足鼎立，第一是捐赠人，捐赠机构，第二个是受益人，第三是执行机构。我觉得第一要研究三者的关系，捐赠人、受益人、执行机构，这三者如果基本达成一致矛盾就小了，如三者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一个朝南就无法完成这个事，但是一般的还是调和，一要坦诚介绍我们存在的问题，二要考虑捐赠人的意愿，这两个之间可能有落差，发电怎么发，靠落差发电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寻找共同的目标，或者大家都要让步，捐赠人要让步，受益人要让步，执行人要睿智，这是唯一的出路。。

傅：这其实也涉及到NGO是不是学习型组织，比如说你们执行项目的时候，有没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做记录？

黄：你讲的这个特别重要，我们过去是传统的报告，现在有博客、微博、微信，还有录像、记录、录音什么的，但总的来说，民促会还是比较认真、注意资料管理的。当然也遇到几个问题。一个是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不太好对公众发布，怕误导公众；第二个是政策的导向影响，第三个是不是敏感性，比如这个是搞人权的，性工作者的，还有艾滋病的，我们做这些项目都很小心。你这个项目与公众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还有是不是值得去推广，我想这是目前需要研究的。

傅：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一句话，留下深刻印象，你说有的时候失败是成功的开始。

黄：是这样的，他要试错，我们知道这个事肯定不会成功，我们也会做这个实验，比如江西亚行财政部的农村扶贫的招标，其实是失败的，但是这个事情对国家是有影响的，民促会也亏本了，还亏了好多。我们叫试错，中国有一句老话，失败是成功之母，就这个意思，是需要失败，包括我们做的好多事其实都是失败的，我真的很坦率。

“‘一带一路’大战略下 民间组织的国际化道路” 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办

黄浩明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社会组织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将能够帮助中国投资赢得更广泛的社会和民间层面的认可，并确保这些投资是“绿色”的。

本刊讯 4月29日，“‘一带一路’大战略下，民间组织的国际化道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举行。美国环保协会主席、清华大学全球领导力杰出访问研究员Fred Krupp（弗雷德·克虏伯）、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出席。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近期提出的一项宏伟战略，通过建设“一带一路”，我国将与沿线各国人民共商、共建、共享人类新的文明成果。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除了需要政府和企业的积极参与，也应该重视和强调民间组织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研讨会现场观众云集，场面火爆。美国环保协会主席、清华大学全球领导力杰出访问研究员Fred Krupp（弗雷德·克虏伯）讲述了他如何在30年中，带领美国环保协会从一个草根组织，发展成为会员超过百万，影响遍布全球的国际化NGO。他指出，美国环保协会通过运用科学和经济两把利剑，将为最紧迫的环境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视作组织的使命。Fred Krupp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世界对中国的要求和期待也逐渐改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中国在环境保护等方面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等方面，中国民间组织应当向世界舞台进发，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民间组织的国际化将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力。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许多沿线国家也将从中国环境治理经验中受益。中国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和成本具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因此，中国的经验可以帮助其他国家更快地在环境保护领域取得进展。

随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表示，由于民间组织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志愿性等天然属性，使其更具有亲和力，便于与沿线各国不同利益、观念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将能够帮助中国投资赢得更广泛的社会和民间层面的认可，并确保这些投资是“绿色”的。

黄浩明谈到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战略的现状。他说目前涉外组织比例非常少，2013年仅占有所有社会组织的千分之一，主要参与人道主义援助事务。他认为社会组织国际化的主要模式包括立足本国，向网络化、区域性和国际化发展；社会组织与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社会组织与当地民间组织合作，而使用人才籍地化；社会组织与当地学术部门合作；与政府合作，参与所在国政府的官方发展援助。他对比了美国非盈利组织的国际化发展路径，从组织治理的维度、合作伙伴的选择、国际业务的合作、人才结构的安排这几个维度分析了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战略发展路径。认为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战略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缺乏政策依据，规模小、资金不足，体制制约、政府资金支持不够，缺乏专业人才。

在会议的圆桌讨论环节，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刘振国认为，社会组织“走出去”是面临转轨的问题，过去中

国基本是受援国的角色，提出“走出去”的角色也是近两三年的话题。现在我们基本在谈如何加入一个国际组织，但是对如何发起一个国际组织还少有提及，这涉及到意识转变的问题。另外，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也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助理秘书长方莉提出中国的社会组织为什么要走出去的问题，认为民间组织的沟通交流工具更柔软更容易接受，而政府的工具更硬更难接受。在“一带一路”的走出去战略中，虽然政府保有互惠共赢的初衷，但是不容易被其它政府接受，所以更需要民间组织发挥重要作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指出，社会组织走出去要超越利益、地域和社会组织的边界，走到公益的范畴中。“走出去”是一个超越的过程。对中国的民间组织而言，“走出去”超出国家的边界，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和挑战。同时他指出社会组织“走出去”需要很多支持，特别是体制的支持，包括学习体制、政策支持体制、合作体制以及人才培养体制等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孙同全谈到以往NGO参与政府ODA的主要目的是提供服务，NGO组织的能力还亟待加强。

最后美国环保协会副总裁、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丹丹德(Dan Dudek)做了精彩点评，他说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在社会组织的国际化方面的确还存在一些障碍。国合会过去为中国政府应对环境问题提出过很多很好的建议，把环境保护的理念融合到“走出去”战略中是非常好的战略思想。EDF不代表美国，而是代表环境，EDF参与国际讨论、谈判是以环境的名义提出保护环境的主张。

此次活动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美国环保协会、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环境保护部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和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共同主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CIDEG主任主持会议。



图为黄浩明在研讨会上演讲

探索多元合作途径 升华社会组织潜能

—广州市社会组织专业化能力建设培训班纪实

三月，南国广州的春天已经早早到来，满城木棉花花开似火，27日为期两天的广州市社会组织专业化能力建设培训班，圆满落下了帷幕。从培训项目落地广州、筹备、招生报名和培训班顺利开展，本身就是一次政府与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专业型社会组织、服务类社会组织与研究类社会组织多元合作尝试。

项目缘起

作为主办方，中国民促会可能并不为广州社会组织熟悉，它自成立以来，积极参与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事业，并始终与国际上从事发展和合作的民间组织和多双边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本届培训班源于中国民促会负责实施的“促进社会组织专业化建设”项目，该项目执行期为三年，从2013年8月至2016年7月止。项目旨在巩固和发展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企业、国际民间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支持机构的联合协作，推进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与管理；还将根据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和新需求，分析和研究社会组织新时期战略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与路径；开展社会组织专业培训，推进社会组织专业化建设，提高社会组织专业能力和整体服务水平。

培训班落地广州，恰逢广州市第二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开锣。2014年，1500万福彩金首次助力全市社会组织投身公益服务，激发广大社会组织活力，撬动社会资源关注公益事业。首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培育扶植了一批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领域涌现出大量具有创新性的项目，创投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广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通过公益创投着力打造一个政府资助、自主创新、自愿出资、运作透明、共创共投的社会组织公益服务平台，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中国民促会与

广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合力举办的社会组织专业化能力建设培训班正可以给广大社会组织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提升的机会。

课程特色

1、职能部门领导直接面对面分析政策。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中央财政支持项目办主任刘振国，介绍中央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策、现状和发展趋势。广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王福军局长详述广州政策和公益创投项目，兼具权威性和前瞻性。参加培训的市内各类社会组织负责人纷纷表示，国字头职能部门和亲切的本市主管部门同时明确发展政策，如同一支强心针，坚定了立足广州，服务社会，发挥自身优势同政府积极合作，参与社会治理的信心。

2、项目设计、执行和财务课程直接对接公益创投。在政策解读分析的基础上，培训班围绕广州市公益创投项目，社会组织密切关心也是难点的项目设计、申报和财务管理等内容都充分体现在了课程设计中。其中，中国民促会黄浩明秘书长图解项目流程和项目目标、市法泽吴治平理事长分步骤理清公益项目行动、市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唐国平主任提出如何避免项目设计误区，以及市政府购买服务特聘财务专家刘书能老师对于财务要求的详尽答疑，都是本届培训课程的创新和亮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课程班最后一节课后，安排了答疑环节，几位老师积极与学员互动，不少问题吸引了现场的社会组织负责人和区县民政工作人员热烈的讨论。在返程途中，邀请学员参观了首届公益创投“城中村幸福活力社区”项目。使得整个培训更加生动合理，从现场回收的培训满意度调查表来看，参会人员对培训的整体评价认为良好、优秀和非常优秀的达到95%。

关于遴选第六届中国贫困山区优秀校长国际领导力 奖学金项目优秀校长的通知

尊敬的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及各位校长：

你们好！为改变我国贫困山区教育的落后面貌，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主管的“第六届中国贫困山区优秀校长国际领导力奖学金项目”校长招募工作即将启动。

该项目将从全国贫困乡村地区选拔出16位优秀校长，赴北京参加为期九天（2015年7月25日至8月2日）的国际前沿课程培训，内容涉及国际领导力、教育体系、人文与自然、科技与信息分享等模块。在气氛活跃的开放式课堂上，校长们可与名师对话，与同行论道，从而锻造出国际领导力，更好地服务于贫困山区教育事业。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德科学中心、

四川德赛尔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比利时金源集团、美国龙安集团、厦门中游投资有限公司等机构给予了大力支持，并提供了坚实保障。

我们衷心希望全国贫困地区的教育部门领导及符合条件的中小学校长认真阅读该通知与相关文件，积极组织、参与报名，相信您将收获一份教育生涯中的别样精彩。

期待与您相聚北京！

此致

敬礼

中国贫困山区优秀校长国际领导力奖学金项目

2015年4月5日

探寻碳市场创新与城市群发展 “低碳中国媒体行”首站武汉市

本刊讯 2015年4月8日,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指导,国家信息中心、中国促进会绿色出行基金、中国改革报等单位联合中国新闻社、新华网等主流媒体携手组成的“低碳中国行2015——低碳中国媒体行”首站来到长江中游城市武汉。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应“着眼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建立健全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联动机制,共同构筑生态屏障,促进城市群绿色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格局”。低碳中国媒体行访问武汉,正是结合这一国家大战略以及“长江论坛”在武汉召开的背景,以媒体的独特视角,探寻未来中国碳市场创新与城市群发展。

“中国碳市场创新与城市群发展论坛”正式发布了“文明武汉、生态长江、美丽中国”的长江宣言,该宣言倡议:“大力弘扬生态文明价值观,培育生态文化,普及低碳理念,着力构建新气候经济发展和低碳社会建设的有效机制;建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联动机制;积极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共谱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发展新篇章”等促进区域生态发展的重要内容。

国家发改委、长江沿线部分省市发改委代表以及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共同呼吁: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用市场化的手段引导社会节能减排,控制污染排放总量;建议将湖北武汉建设成为全国碳金融市场中心,形成与上海、深圳等传统金融中心并行的新兴绿色金融体系,从政策和金融层面支撑实体经济低碳转型发展,助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建设,走出一条低碳发展的“绿色崛起”之路。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提出:“碳市场是治理城市群中城市病的有效市场手段,通过对排放进行总量控制,运用市场手段淘汰落后产能,不仅能够增强产业的集中度和技术先进度,增强产业的竞

争力,避免产业转移带来污染转移,同时还能有效降低社会减排成本,充分调动企业主动减排的积极性。”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国家碳市场管理部门——国家发改委气候司蒋兆理处长的呼应。据了解,国家发改委去年12月正式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17号令),进一步明确了全国碳市场建立的主要思路和管理体系,拟在湖北、北京、天津等七省市碳交易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

据“低碳中国媒体行”记者在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采访了解:湖北碳市场总成交量、总成交额、日均成交量等市场指标仅次于欧盟碳市场,位居全球第二、中国第一。截至2015年3月31日,湖北碳市场总成交量1186万吨,交易总额2.7亿元,分别占全国成交总量48%和成交总额的32%;各类碳金融授信已达800亿元。与此同时,碳市场的建立极大的调动了企业投资减排、主动减排的积极性。据统计,企业2014年在节能改造上的投资比2013年提高38%,部分控排企业通过碳交易已经直接获取减排收益5534万元。



“低碳中国媒体行”首站武汉探寻碳市场创新与城市群发展

2015新常态下的公益事业发展论坛在沪举办

本刊讯 5月10日,由爱德基金会、上海仁德基金会、上海爱德公益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爱德基金会、中富国帮、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资助的“2015新常态下的公益事业发展论坛”在沪举办。

开幕式上,上海市民政局慈善管理处处长张晓颖指出,公益慈善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它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也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面对眼前的机遇和挑战,如何进一步践行拓展是一个重要课题。作为论坛主办方之一的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之一,有责任、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这本身就是一种新常态的体现。中国公益界应该承

担起更多的国际人道主义责任,配合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在推动区域合作和促进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有所作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以《公益经济从找回丢失的GDP开始》为题作了主旨演讲。他以海外公益经济发展现实为例,对比国内社会事业发展的尴尬,呼吁政社分开,以科学合理的独立统计标准系统建立社会经济部门,让其做长、做实,从而促进整个公益行业的发展。

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杨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师曾志,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上海爱德公益研究中心理事长卢汉龙,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徐家良,美国永亚公益咨询公司总裁卢咏等政界、学界、公益界专家以及NGO从业人员,共近200人参会。

民促会百科

中国民促会家长教师合作委员会成立

由全国30多家单位和个人联合发起的中国民促会家长教师合作委员会于4月16日在北京成立。中国民促会家长教师合作委员会为中国第一家国际化的全国性家校合作组织，这就是国际上普遍设立的“家长教师协会（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简称（PTA）”。

教育部在2012年2月27日发文指出：家长委员会对于发挥家长作用，促进家校合作，优化育人环境，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今年初，教育部委托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了家校合作教育研究中心，来开展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少数地方如北京、重庆、甘肃、广东也先后建立了家校合作协会或研究会。

家长教师合作委员会由关注并促进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合作的社会机构、教育界人士、广大家长组成。工作宗旨是依据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教育要求，借鉴国际民间组织经验，推动家庭、学校与家长、教师间合作，凝聚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助力教育改革。中国PTA今后将努力发挥五个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推动教育公平、公正和民主化的进程：

（一）借鉴国际间家长与教师合作的经验，推动我国的家校合作与亲师协同，激励教师与家长构建互助互信的伙伴关系，帮助家长学习与教师协同教育的知识与技能，化解家校、亲师间的矛盾，维护双方的权益。

（二）指导中小幼儿园的家长委员会、家长与教师合作协会的建设，推动家校合作、亲师协同的理论研究与经验分享，建立双方合作的良性激励机制，促进社会资源对教育事业、家庭文明建设的支持。开展家长和孩子的共同活动，增进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努力开展一些家长和孩子共同参加的志愿者活动，如环保、社区服务、探望老人、捐献等活动。

（三）促进家庭和与国际同行的合作与交流，构建有

中国特色的家校合作、亲师协同的模式，提升我国的家校合作水平与国际影响。

（四）组织有效力量，为和谐社会发展和现代教育制度建设建言献策。发挥民间组织的应有作用，承接与政府、社会机构、企业组织的合作项目。开展专业人员的培训与资格认定。向社会公开招聘一些从事专业研究的家长志愿者，建立一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队伍。这些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甚至是某方面的专家，有较强烈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感，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某个家庭中孩子的教育，也关注政府、学校整体的教育事务。

（五）建立PTA门户网站、出版全国性的刊物《中国家校合作教育》，寄送给各地、各校的PTA和家长委员会；发掘收集各地出色的PTA活动实践案例；呼吁有关部门为净化儿童教育的环境采取共同行动，如经民意调查确定最适合和最不适合儿童观看的电视节目、图书等。



中国民促会理事赵刚介绍成立家长与教师合作委员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四川德赛尔化工为教育扶贫项目再捐10万元

本刊讯 近日，四川德赛尔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彭先成先生再次为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捐赠善款10万元，用于执行中国贫困山区优秀校长国际领导力奖学金项目和海外学子支教项目。

作为项目的捐资人之一，彭先成先生一直高度关注校长奖学金项目的发展与运营。自2010年为及人公益教育机构首度捐款90461元起，该项目已收到彭先成先生多笔持续捐赠。与其他捐赠者和支持者一道，彭先生所贡献的长期而稳定的善款，为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大力支持。

教育和脱贫紧密关联。项目主管单位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先生说，“我们高度赞赏彭先成先生的善举，我们由衷感谢他和对扶贫助教圆梦项目持续关注的企业家和爱心人士。中国的贫富差距之所以逐渐拉大，归根结底是教育问题。一些地区的学生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而如今城市里的孩子初中结束就可以被送去国外接受更好的教育。”黄

秘书长表示，“我们要与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携手，从社会的角度努力缩小该差距。”

彭先生多次强调项目的重要性，他说，“该项目志愿者做的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值得持续投入资金、关注和精力。”

谈到项目的未来建设，彭先生表示，“经过五年之久的运营，项目前期工作做得已经很扎实，希望项目后期也要重视起来，对参与校长和志愿者要全面跟踪，这样才能形成一种长效机制。”在项目举办过程中，彭先生总是在百忙之中抽身赶赴北京，向各位校长、志愿者了解实际情况，并为项目的进一步发展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据悉，近10名志愿者正在紧锣密鼓筹备校长奖学金项目和扶贫助教项目，同时也计划在今年7-8月项目执行期间召开中国教育与脱贫国际圆桌论坛并举行项目“五年历程”回顾录及短片发布仪式。

（项目传播团队志愿者赵艺男）

简讯

中国民促会在京召开六届理事会 四次全体会议暨顾问会议

本刊讯 2015年4月16日，中国民促会在北京召开了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暨顾问会议。肖凤怀副理事长代表姚申洪理事长向会议致开幕词，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做了中国民促会2014年工作总结和2015年工作计划的报告，刘彤茜副秘书长做了中国民促会财务工作报告，潘大洲常务理事就会员退会，理事成员退会，增加新会员，理事更换代表和新增理事做了说明，赵刚理事做了成立中国民促会家长与教师合作委员会提案的说明。

经过理事和理事代表讨论和审议，本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民促会2014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以及中国民促会2015年工作计划；审议并通过了4家会员单位入会、一家会员单位退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新增6家理事单位，本次会议还讨论并通过成立中国民促会家长与教师合作委员会的提案。

会议由张建宇常务理事主持，参会的理事、理事代表、顾问和专家就中国民促会战略转型、2016-2020战略发展规划以及业务重点化、筹资策略、项目管理和国际交流等内容提出具体的建议和意见。（公关部供稿）

新兴国家及全球发展圆桌会议 在京召开

本刊讯 2015年4月22日，绿色出行基金的孟闻达代表黄浩明秘书长在北京出席了由英国国际发展研究院、中国发展国际研究网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联合主办的新兴国家及全球发展圆桌会议。

英国国际发展研究院院长Melissa Leach在会上公布了新兴国家及全球发展中心的工作目标：主题性研究，与其他国家机构互相学习，建立伙伴关系；对新兴国家的研究，主要以政策为基础进行研究；发展研究相关的工作及培训。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局局长程国强就2015年工作计划发表了讲话，主旨为2015年DRC筹备建立的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与一带一路智库网络的相关情况。

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CIDRN）是由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牵头、由全国从事国际发展政策和理论研究的相关机构和专家组成的学术交流平台，主要致力于研究中国在国际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互动关系。（公关部供稿）

任慧赴意大利巴勒莫参加 欧亚城市农耕项目启动会

本刊讯 2015年4月20-24日，中国民促会项目管理部任慧赴意大利巴勒莫参加了由欧盟委员会资助的欧亚城市农耕项目启动会，此项目为期两年。会议由意大利欧亚研究和倡议中心CESIE主办，详细介绍城市花园主题对项目的背景概况、执行

活动、财务管理、宣传评估及任务安排。除此，主办方还安排了地方城市花园的考察活动。来自中国、印度、尼泊尔、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的项目协调人员共8人参加。（气候变化小组供稿）

中学生气候变化教育项目 第六期教师培训在福州举办

本刊讯 2015年4月18-20日，由德国粮惠世界资助、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执行的中学生气候变化教育项目第六期教师培训在福州举办。

培训由北京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李力主讲，环友科技艺术顾问郝秀玲提供艺术指导，培训主题涉及气候变化的由来、食物里程、空气与健康、水源地污染等。培训采取参与式的方式，融合演讲、小组讨论、互动采访和艺术表演等多种教学形式于一体，在互动中学习气候变化知识，在活动中感受环境变化的危机，在游戏中提升环保行动能力。中国环境报福州记者站站李良就中国及福建省面临的环境问题和在学校开展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做了专题报告，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张鼎华教授向大家介绍了森林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培训由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及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承办，来自福州、莆田和南平的中学、职教学校的教师和NGO代表及部分幼儿园的教师共60人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增加了莆田和宁德远程培训的分会场。

促进社会组织专业化建设项目在 贵阳、南京培训

本刊讯 2015年4月24-25日，促进社会组织专业化建设项目华东华中地区培训活动在江苏南京举办。承办方为南京大地文化交流中心（南京绿色之友），同样聘请四川农业大学邓维杰副教授作为主讲培训师，来自湖北、江苏、浙江的30家机构32名学员参加此次培训。

培训师根据学员对知识框架和知识点的理解，设计了具体的案例带领大家分析，梳理了项目开发与设计思路；主动反应型与主动预测型；以及根据具体需求进行SWOT分析、运用问题树、根状图等工具找出问题与对策，运用SSI的排序方法对问题排序，并强调了在分析过程中要坚持SMART原则。

又讯 2015年5月13-14日促进社会组织专业化建设项目西南地区培训课程活动在贵阳市举办。承办方为贵阳南明区爱心家园儿童特殊教育康复训练中心，聘请四川农业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邓维杰副教授作为主讲培训师，邀请来自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的28家机构28名学员参加此次培训。

“低碳中国行2015”在深圳启动

本刊讯 2015年3月24日，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民促会绿色出行基金、中国低碳联盟、深圳市政府等主办单位在深圳华侨城湿地联合对外发布了“低碳中国行”2015年系列活动的內容和工作安排。

今年将是“低碳和气候变化”的“大年”。据主办方介绍，今年，将继续开展“低碳榜样评选”、“低碳中国专家院士行”、“低碳对话”、“巴黎气候大会·低碳中国行中国角边会”等一系列低碳主题活动。